

啤酒的肚

颜炼军——著

非外借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啤酒的肚

颜炼军——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的啤酒肚 / 颜炼军 著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18.8

ISBN 978-7-5207-0501-1

I. ①诗… II. ①颜…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3381 号

诗的啤酒肚

(SHI DE PIJIUDU)

作 者 : 颜炼军

策 划 : 陈 卓

责任编辑 : 安玉霞

出 版 :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 : 100007

印 刷 :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 10.5

字 数 : 188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207-0501-1

定 价 : 42.00 元

发行电话 :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 我社负责调换 , 请拨打电话 : (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录

代序 关于批评的小杂感	001
诗人之情，见乎文辞	004
“大国写作”或向往大是大非	014
膨胀的经验，微茫的诗歌	036
悬案，或迷津的火焰	050
“囚禁于万千波涛中的海的女儿”	076
痛苦的血肉与黄金的歌唱	088
“母语正背离我的嘴唇”	109
昔我往矣	131
一颗穿越时空的水滴	147
彷徨于无地	154

踮起脚尖，现实就能够得着传统？	170
重新编码的传统和当代诗意景观	186
化解对立面	207
颐情志于典坟	231
回首光芒，驻足深渊	251
解开或创造“惊讶”	267
不减清辉（访谈）	292
钻石，或最大的宽度（访谈）	300
好的批评家应活在人间而又超凡脱俗（访谈）	312
后记	326

代序 关于批评的小杂感

文学批评是一项“虚无”的工作。

人类不长的历史，前人留下了海量的文学作品，当代作家书写不断，使得这个大海的面积不断延展，这么强大的言说欲望，表明了人类的心智是何其脆弱！批评家须对这些作品进行辨识、拣选，并津津有味地说出哪些更好，为什么好，难！

这个工作似乎向来费力不讨好，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里早已说过这种尴尬：“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已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

今天的文学批评，除了刘勰所说的尴尬，还面临更多困境。首先，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文学正在边缘化或娱乐化。严肃的文学批评作为与文学作品的对话，其有效性正在减弱。其

次，现代生活的图像化、信息化，剧烈地改变了人类与文字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深度”文学批评写作亦面临合法性危机。由上观之，一个识相的当代的文学批评写作者，天然就是面向虚无的写者。

然而，文学批评又必须编织意义。

文学批评是关于文学书写的再书写。人类的书写行为，起源于虚无感和恐惧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书写行为，人类写出了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它们构成了我们灵魂栖居的三维家园。面对空空如也的广大世界，文学书写指向性灵之奥区，是人类最为个体化的书写行为，它“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心雕龙·原道》），让人类找到了内心与宇宙天地共振的节奏与韵律。文学批评面对的是作为人类灵魂表征的文字世界，它以此来探讨灵魂的困境与未来，参与人类生存意义的编织和刷新，于混沌之世澄清恒久之至道。

一流的文学批评须依赖一流的文学作品展开，正如一流的钢琴演奏技艺须一流的乐曲才能完美展现。因此理想的文学批评，绝不是批评那些写得不好的作品，而是发现、阐释一流作品。

文学批评有滞后性，因此需要耐心，需要犯足够多的错误。文学批评亦如预言，有超前性，需“别材”与“别趣”。

作为一种阐释性书写，文学批评所需的知识与见识同样重要。

理想的批评写作不光要有理有据有思想，更要言之有文，磨砺绝技，不时让旧句换新颜。

好的批评家经常理屈词穷。他视写为洪水猛兽，因此常常希望退居普通读者的行列，合上书页，抬起头，就能让所有作品都随着夜读的气息而消失在花香之中；但是，总有些语言片断不时从忘川中猛醒，迅速而颤抖地挫于笔端，形单影只，一会儿骷髅，一会儿玫瑰。

诗人之情，见乎文辞

——当代诗歌本体问题试谈

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中说过一句很微妙的话：“圣人之情，见乎文辞。”如果我们斗胆把圣人换成诗人，那么可以看出一个朴素的道理：诗人总是在练习如何把对生活世界的感觉（情），转换为诗行（文辞）。学康德的话说，诗歌把直观感性统摄入自身的知性秩序——某种超越了日常语言质地、摆脱了字面意义束缚的精密的词语“装置”。对这种特殊的词语“装置”，中国古代诗人认为其基本特征是有“别材”和“别趣”。一个智慧的“别”字，把它同所对应的事物/现实区分开，也把它与日常语言形态分开。我们可由此回到下列诗学常识：诗人和非诗人的区别，在于他/她能否把生活世界锻铸成诗；诗人优

劣的区别，在于锻铸水平的高下。诗歌在追求精确的内在统一性和令人遐想的包容性时，一定得把散乱的“现实”零件琢磨、重组，甚至碾压，使之成为天真兴致、超拔警策的图式。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里自信地说“我爱人会在我诗中把青春永驻”^①，生动地表明了诗歌作为语言，乃是对现实的告别和叛离，也是对现实的判决。

事实上，汉语文学理论话语说的“现实”，常指整体的、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现实，它常常被意识形态偷梁换柱，而非个体意义上的生活现实。比如，杜甫写“三吏”“三别”，写安史之乱，我们会说这是“现实”的，但他写“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可能就被认为不那么“现实”；韩愈写《马说》，可能会被认为是“现实”的，而写齿落的诗“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齿落》），也会被认为不那么“现实”。上述区分的缺陷是显然的：意识到自己在天地之间渺小地存在的美感，或者牙疼得天崩地裂，可能是一种更为切身的“现实”。对个体现实的尊重不足，或许是汉语诗学乃至汉语文化的弱点之一。

面对整体意义上的“现实”，尤其需要诗歌具有叛离的能力——诗歌把现实拖拽入语言的能力。理由很充分，整体意义

^① 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上的“现实”之强大和喧嚣，以及其背后无形的意识形态之手，都汲汲于同化来自诗歌的声音。

二

由于整体性现实的上述特征，当诗人直面它时，需要更强大的语言“熔化”能力。他们常常需要从前辈或同行那里寻找语言或形式的突破点，有时则需要发现被遮蔽的传统。在一流的诗歌中，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之多，经常超出我们的想象。

诗人 T.S. 艾略特晚年曾坦言，他得益于整部《恶之花》的，主要是其中的半打诗行。下面两行诗概括了波德莱尔对他的所有意义：“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市，/ 大白天里幽灵就拉扯着行人！”^①从艾略特写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和都市景观的诗中，确实可以看到波德莱尔“基因”的遗传。简言之，波德莱尔启发了艾略特，启发他如何把“现实”拽入语言之网，进而让诗歌“伪装”成“现实”。用当下时髦的理论术语说，艾略特乃是现代诗人中“介入”特征很显著的一位（在英语诗人中，仅就写都市工业雾霾而言，亦鲜有可匹者），但他似乎很少被列入显赫

① [英] T.S. 艾略特：《批评批评家》，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的“现实主义”行列；同样，在20世纪的所有公认的杰出诗人里，我们几乎很难把其中任何一位完全摀入“现实主义”的阵营，相反，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一度被划入“现实主义”阵营的诗人，暗地里都藏着一个内在的“现代主义”者。笔者无意继续辨析这对暧昧的概念，在“现实”或“介入”成为诗学话语焦点的当下，让我们回到一个最为简单的写作实情：一行诗，无论写笑还是写泪，无论写义愤填膺还是写情欲如火，无论是写社会历史场景还是复杂的内心，它首先变成一连串词语，变成某种语言现实。艾略特从波德莱尔那里学到的，肯定不是波德莱尔描写的巴黎现代都市图景，而是波德莱尔将之转化为语言现实的途径。同样，当面对艾略特“I am aware of the damp souls of housemaids/Sprouting despondently at area gates.”（“我感到女佣们潮湿的灵魂/在大门口绝望地发芽。”）^①这样的杰出的诗行时，我们感到惊异的，肯定不是诗歌里所写的下等女用人的绝望境地，而是诗人如何采用了好的比喻、好的词语编织法，把“绝望”编织出来。

好诗人常对来自传统的吞吸力心存警惕，但命名“现实”的迫切需求，亦常常促使他们去发明自己的“传统”。我们接着举一个诗人波德莱尔本人的例子。在《恶之花》开篇，波德

① T. S. Eliot: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P29.

莱尔写母亲对他的无奈时，把母亲生下诗人比喻为生下一堆蝥蛇。^①多年前读到这里时，我被这个比喻彻底征服了，真是大师手笔！前不久读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时，一个无端闪到眼前的细节，让我对波德莱尔生出另一种敬意：克鲁泰墨斯特拉伙同情人，谋杀了刚从特洛伊战场辗转归来的丈夫阿伽门农。阿伽门农与克鲁泰墨斯特拉之子奥瑞斯忒亚为了替父亲报仇，无奈要去杀自己的生母。在被杀前不久，克鲁泰墨斯特拉梦见自己生下一条小蛇，这被认为是凶兆；因此临死时，她愤恨地对儿子说道：“你便是那条毒蛇，我把它生下，给它喂奶！”^②在波德莱尔的时代，社会对诗人的敌意已经非常明显，波德莱尔化用这一古老的比喻，精确表达了现代诗人的处境，可谓脱胎换骨，青出于蓝。由此我们不仅看到，由于写《恶之花》而被错认为是败坏道德的浪荡子的波德莱尔，其实有非常博雅的内质；更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大诗人，波德莱尔在考虑如何写、如何接近他理想中的词句上所耗费的心力，是十分罕见的。只有知晓这个，才能理解他为何一生只写一本诗集，历经数次修改，直到去世前，他还在修改这部诗集。可见伟大的现代主义

① [法] 波德莱尔：《恶之花》，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页。

② [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71页。

者，完全可以包含古典主义者；反之亦然，好的诗歌向来与伪古典或伪现代互不相容。

三

我们都会同意，面对当下复杂而残酷的生活世界，面对由技术理性疯狂地钳持着的人类未来，看着地球在冰冷宇宙中昙花式的繁华、渺小与虚无，任何严肃的汉语诗歌写作者，都可能产生福楼拜式的焦虑：“一本书既无教益也无趣味，不涉及化学、哲学、农学或悲歌，一本书提不出养羊或者杀灭跳蚤的任何好办法，既不谈论铁路、证券交易所、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私、中世纪的服装，也不谈论上帝与魔鬼……”^①如果诗歌不直面它们，其意义何在？但是上述追问，已经与生俱来地包含在所有严肃的诗歌写作中；只是很多时候它们被现实 / 艺术的二元论粗暴地劈开了。这导致的后果是，是否对“现实”负责，成了责难诗歌的常见理由，成了衡量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有时甚至成为替平庸之作辩护的逻辑前提。当它与大众媒体声气相投时，便无限地放大了公众对诗歌的责难和误解，甚至给了许多所谓精

^① [法] 福楼拜：《一个简单的心》，李健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3页。

英攻击当代诗歌的借口。似乎，这个世界是诗歌和诗人搞坏的。于是乎，为诗辩护，被迫成为一项无休止的诗学任务。

来自“现实”的诗歌批评者须认清，诗歌作为最微观、精确的词语艺术，天然地充满着元写作的特征。当诗人考虑把哪些词语放在一起时，他考虑的首先是来自语言内部的束缚，以及解开束缚后的可能——也许是经验经由想象力的一次爆破，更可能是一次老生常谈的失败。无论面对大地震的灾难还是面对室内一株枯萎的花，无论面对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还是面对家门口的一场车祸，如果诗人想让某种“现实”进入诗，那么在诗人开始写的那一刹那，这个“现实”就已经成为一个有待展开的语言疑团。我们在杰出诗行中看到“现实”，乃是词语爆破后，永动机式的词语动态运转图景。

我可以随便读一首当代诗，来看看上述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当代诗人臧棣有一首不太被注意的短诗，是这么写的：“我用芹菜做了一把琴，它也许是世界上 / 最瘦的琴。看上去同样很新鲜。 / 碧绿的琴，镇静如 / 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 / 但并不缺少线索。 / 弹奏它时，我确信 / 你有一双手，不仅我没见过， / 死神也没见过。”^①在这首短诗中，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一个“现

^① 臧棣：《芹菜的琴丛书》，见《骑手和豆浆》，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

实”被展现为语言的过程。作为一种常见蔬菜，芹菜乃是日常之具象，也许是转基因的、有农药残留的日常。这如何入诗？任何一个不回避“现实”的诗人，都会考虑这一问题。诗人臧棣在“芹”与“琴”的谐音关系中，发现一条有点危险的通道。“芹菜”被诗人比喻为“最瘦的琴”，事理上很清楚，又不失奇趣。这背后包含元诗意识——诗人仿佛在告诉读者：看，我在芹菜中找到了诗歌的起点（琴与诗可以互喻）。琴/芹菜的“镇静”，正如“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这句举重若轻地展示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的生存困境：小而言之，个人陷入困境时，这困境差不多就是宇宙中最难的；大而言之，现代人的困境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宇宙困境，因为宇宙已经被现代科学质料化了。诗人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个有一双能弹奏“芹菜之琴”的手的“你”，超出一般生死经验的“你”是谁，但我们显然可以感到，这个有超验气质的“你”可以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某个隐蔽的自我，也可以是一个能够在芹与琴之间，在我—芹菜—琴—宇宙之间重建关联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她扮演了缺位的神的角色。

简言之，我们在诗中看到，“我”与“芹菜”之间的日常关系，被转换为匿名的、有些超验色彩的“你”与“琴”之间的关系，狭隘的日常生活世界，被提升为面对宇宙难题的“镇静”。而这一切，显然是在一个个词语的突进中完成的。这是

一首非常典型的现代诗，它回答了大众每每追问的问题：现代诗到底写什么？把非语言的、非诗的事物转换为语言的过程，把现代个体困境崇高化的过程，几乎是所有合格的现代诗歌的基本主题。

四

通过读臧棣的这首短诗，我想说的是，“现实”与诗歌写作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本体性的关系：一首好诗最重要的特征，是使之成为诗而不是其他的那种内在逻辑——反言之，肯定不是诗歌所写的现实对象决定其好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我们在谈论诗歌的介入性，或者说诗歌是否关注所谓现实时，我们关注的，不应只是它们是否对现实之恶发言，而是如何对它们发言。

每个合格的当代诗人都在以各种方式对现实发言——事实上当代诗歌已经有许多杰出的发言。诗歌批评或阐释，更应该去关注诗歌技艺的实现程度，它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局部或整体的突破，品评其得失，并以此为基点展开诗歌的社会学探讨；而非粗暴地以是否与“现实”相关为标准来衡量诗歌的价值。现实，对诗歌而言，只是感性的杂多和盲目，诗歌如何由此建立起自身的诗性结构，是一个直面语言的问题，质言之，诗歌与世界的